

# 周素園傳略

(征求意见稿)

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

周素园原名培艺，别字树元、澍元。公元1879年农历润三月初七，诞生在毕节县城内一个破落了的塾师家庭。自幼在家中学习。

1895年考取秀才，后为贡生。时当中日甲午之战，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，中方一败涂地，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“马关条约”。这对他刺激很大，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，使他深痛所学的四书、五经的无用。1897年贵州提学使严修劝他钻研经学。他回答说：

“中东之役〔注：东，即日本。中东之役指中日甲午之战〕，丧师辱国。强邻环伺，惧陷瓜分。我辈尚不亟〔注：亟，与极通〕谋改良政治以图救亡，宁再事咬文嚼字邪！”

〔引自《稽勋表册底稿》之四，陈永锡执笔的《周培艺事迹》〕。此后，他千方百计觅取新书，如《校邠庐抗议》、《续富国策》、《出使英、法、义、比日记》、《万国史记》、《万国公法》、《海国图志》、《泰西新史揽要》、《时务报》、《湘报》等等，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，以扩大自己的眼界，了解世界，认识世界。从而接受了国内主张维新、改革的新思潮。

1899年至1905年，周素园对清封建王朝专制统治作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。他写道：“方今外侮荐至〔注：荐，音见。作再解〕，内政又复不修，上下相蒙，政以贿存。嗜利

贱货，结习深于人心，牢固而不可破。”

“天下之人以为筮仕〔注：筮仕，即初次外出做官〕皆以牟利，固恬然不知怪。夫如是故汲汲〔注：汲汲，心情急切的样子〕以官为寄，而惟剥削侵渔之是务。民积困而不苏，国亦积弱不振。”〔引自《送罗方泉之官广西序》，见《素园文存》。〕他认为封建科举、教育制度是“涂饰耳目，欺网身心，习与用左，仕与学歧。”〔引自《送王子儂游江西序》，见《素园文存》。〕他揭露清朝统治者当时也唱变法高调，是因为：“政府虑外人之迫，则以变法缓之；直省希政府之旨，则以变法媚之。”〔引自《与刘黎青》，见红格本《素园书牍》卷一。〕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，清朝政府的统治者们，却“隄溃防决而营谋私利如故，栋折榱崩〔注：榱，音催。屋椽屋角之总称〕而粉饰太平如故。”〔引自《为黄德铤致刘统之》，见红格本《素园书牍》卷二〕。

面对日、俄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东北三省利益而爆发的日俄战争，他“特恐英、德、法、美竞思染指，实行瓜分。大陆之上，遂永永无我国旗。兴言及此，不觉失声痛哭矣。长夜漫漫，俯仰身世，不能成寐。”〔引自《复宁益之》，见红格本《素园书牍》卷二〕。

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，认为不

出数年政治局面又将更易。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，他心情非常激动，他认识到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责任。他说：“仆闻英雄造时势，时势亦造英雄。人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，已负此巍然七尺；至不能为时势所造之英雄，宁非天地间之駉枝赘疣！仆每念及此，方食失箸，中宵起立，无疾而呻，严冬而汗，诚不知其所以然。”〔引自《与普安师范学生张友栋、郭光焘等》，见红格本《素园书牍》卷一〕。他感到：“然当此存亡绝续之交，生死肉骨之际，惟万众一心，作多方面之努力。”〔引自《为闵华甫致李弗田》，见红格本《素园书牍》卷一〕。他又说：“吾人欲求救亡之术，惟有一心一德，结合团体，化除私见，以谋公益。”〔引自《为黄德铎致刘统之》，见红格本《素园书牍》卷二〕。这些，说明周素园已认识了组织革命团体，进行多方面革命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

1905年下半年起，周素园在贵阳开始筹办《黔报》。1907年7月17日〔农历丁未六月初七〕，《黔报》创刊发行，周素园是唯一的编辑。《黔报》是贵州第一家报纸，它的宗旨在于“开通民智”。即鼓吹爱国主义，反对列强瓜分中国，唤醒群众，推行政治改革。它的出版，为贵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。

在筹办《黔报》期间，周素园经友人介绍结识了张百麟。在张的帮助和影响下，他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，投身到了方兴未艾的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浪潮之中。

1907年10月，周素园作为发起人之一，参加了自治学社成立大会。自治学社这个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的建立，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特色。它是以“学社”为名，而以政党为实；因而它得到了官方的批准，但又暗中作推翻清朝反动政权的准备；它以合法的、公开的活动进行革命的宣传、组织工

作，又以秘密的活动准备武装起义；它的领导人和骨干以品德、学识、能力为社会所推崇，而成为社会团体的领袖，甚至成为官府参与机密的幕僚。这种情况，在辛亥革命前我国各省中是罕见的。

自治学社成立后，张百麟要周素园参加决定党的路线，同时，利用他的社会地位，应付官厅，应付社会，为党谋生存发展。在这以后，他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性的群众团体和官府幕僚工作，以推进革命运动。他先后担任了贵州警务公所行政科长，贵州谘议局筹办处书记，贵州商务总会文案，贵州教育总会书记，贵州自治筹办处文牍科长，贵州学务公所议绅等等公职。

1910年1月，自治学社发起国民捐运动，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宣传。贵州反动统治当局逮捕了负责街头宣传的陈永锡。党人中有的害怕委缩。周素园却坚定地对同志们说：“我辈革命死，不革命亦死。等死了要以为革命死为最大幸事，何惧哉！”〔引自《稽勋表册底稿》之四，陈永锡执笔的《周培艺事迹》〕。

1910年底，自治学社组织上作了改组，钟昌祚任社长，一切活动由张百麟统一指挥；另设政交俱乐部（实际是最高干部会议），制定政策和策略，由周素园任主席。不久，通过平刚的介绍，自治学社集体参加了同盟会。这时，自治学社不仅自身基础日益巩固，而且也成长为能左右贵州社会的强大政治力量。

1911年（农历辛亥年），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各地革命运动彼伏此起，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。周素园认为革命时机已成熟，和张百麟等人共同商定举行起义。张百麟最初的计划只是依靠哥老会，周素园、平刚等人建议联络军界，于是派人分头进行。11月3日晚发动起义，取得成功，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封建统治。这是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领导

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胜利。11月4日，周素园和张百麟、平刚等七人被推选为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员。11月7日，大家以周素园政治经验丰富，推举他为军政府行政总理。

1912年3月1日，刘显世等人勾结滇军进入贵阳。次日，滇军猛攻都督府，军政府被颠覆。4月20日左右，周素园得知政敌密谋要对他下毒手了，只得强忍妻子刚去世的悲伤，间道逃离贵阳。“委弃三女一子，长方毁齿，幼者尤在襁褓”。从此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活。

是年5月，周素园到了重庆。夏初到了汉口。冬初到了北京。从到重庆时起至1913年11月离开北京的一年半里，他起草了致北京政府、致国务院、致袁世凯、致孙中山、及致社会各方面的大量文电，揭露滇军和豪绅相勾结，里应外合颠覆贵州军政府的经过，和他们在贵州的残暴罪行。他向黎元洪申诉。他多次与自治学社流亡北京的同志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控诉，当权者置之不理。他说：“是时亡命初期，妄意社会尚有是非，国家尚有法纪，竭吾力所能，从多方面哀籲〔注：籲，与吁通〕而呼诉，顾其效乃甚微。”〔引自蓝格本《素园书牍·第三卷跋》〕。后因在北京组织“黔人冤愤团”，被唐继尧向袁世凯诬告为组织革命机关，袁明令通缉，他被迫离京到四川。

在北京期间，1913年1月至4月，经冯自由推荐，任临时稽勋局调查员，专办贵州问题。他起草了贵州稽勋案交付审议。同年5月至10月，为解决生活问题，任参议院秘书。

周素园到四川后，由于子女在毕节无人照料，子诚一被烫伤夭折。只得将家眷接到泸州小市。定居不到一月，刘显世党羽追踪到了泸州，仓惶避之重庆。1914年6月，到了合川，为县知事张秉衡办文糊口。9月，张被戴戡诬为乱党被逮捕。周素园急走汉

口，寄住亲戚家，靠借贷度日。他向亲友求援谋一职业，处处碰壁。他悲愤地说：“世界之大，独无容我立足之地。”但祸不单行，1916年3月他的第二个妻子因难产在汉口去世，遗下了出生才三天的婴儿（四女宁一）。

1916年6月，袁世凯死，黎元洪继任大总统。是年末，周素园从汉口到北京。1917年4月，被聘为交通部顾问，任职一月，因部长易人而被解职。6月，被任命为众议院秘书，任职又仅一月，因国会解散而复失业。只好闭门静坐研究明史和整理文稿。一家五口，靠借贷渡日。

过这一阶段的流亡生活，周素园自己写道：“自甲寅〔1914年〕迄乙巳〔1917年〕历时四年。累濒虎口，频届断炊，罹丧偶之大凶，遭近亲之白眼，千灾五毒，狼狈极矣！”“徬徨歧路，进退失据。综言之，在境遇上则陷奇穷，在精神上亦邻于自杀。”〔引自蓝格本《素园书牍·第四卷跋》〕。

1916年周素园和张百麟在上海曾商量了他们的斗争策略：“无论何党何派，能解决贵州问题的，我们便和他合作。”〔引自《自传》〕。那时张在南方已站住了脚跟，北方由周素园想法子打通。从1917年下半年起，他开始和徐树铮通信。1918年3月，被徐任命为奉军总司令部秘书。5月，段祺瑞、曹琨等发动了反对陆荣廷、唐继尧的战争，他被派到湖南。他在给张百麟的信中说，起初他还“雄心勃勃，以为身临前线，数年来卧薪尝胆，复仇之机会至矣！乃一察其内容，与我之所希望者不啻背道而驰。”

〔引自《复张石麒》，见红格本《素园书牍》卷八〕。但为了谋生，1918年10月，转到西北边防总司令部（后改为西北筹边使公署）任秘书之职。1920年7月，皖直战争爆发，皖系战败，徐树铮被免职，他又失业了。

1920年11月，贵州政局发生变化，刘显

世被其部下驱逐了。领导其事的王文华约周素园到上海去见面。王文华欢迎他回贵州，请他担任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政务厅长。1921年春节后，周素园从北京举家到上海，准备和王文华一起回贵州。不料王文华在上海遇刺。后王伯群继任贵州省长。王伯群催促他先回贵阳，在贵阳的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亦有电敦请。他既已答应与王合作，为了不负王的情谊，不得不回贵州。

1921年10月，周素园回到贵阳，受任为黔军总司令部参议，后又兼任了秘书长。次年1月，黔军内部谷正伦、何应钦两派矛盾大爆发，何被赶走，谷派进军贵阳，他被迫离职。于1922年2月初回到毕节。

1922年5月，袁祖铭得到吴佩孚的支持，带领“定黔军”回到贵州。袁一方面威逼，一方面多次发电邀请周素园去贵阳，任他为定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。8月，委任他为政务厅长兼省府秘书长。1923年5月，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兵入侵贵州，袁军一再溃败。周素园随袁到铜仁后，请假去上海休养。1924年5月，袁祖铭被吴佩孚授以川黔边防督办，在重庆设督办公署，请周素园到重庆担任秘书长。同年11月，他被委派为袁的全权代表，去北京和段祺瑞的执政政府联系。在北京期间，参加了段祺瑞主持的“善后会议”，并去沈阳会见张作霖、杨宇霆、张学良；冯玉祥邀请他去张家口见了面。1925年3月回到重庆。同年8月辞职回家。

从北京返回贵州这一时期，情况和他原来想象的大不一样。他看到的是军阀们“相斫相杀，暴君污吏，弥望接踵。”人民“顛覆〔憔悴〕呻吟，倒悬不解”。〔引自《符经甫之父母七十双寿序》，见《素园文存》〕。对同袁祖铭的合作，他说：“生平只有被袁鼎卿〔注：袁祖铭，号鼎卿〕屈服，是我一个污点。贵阳时期是武力劫持。重庆时期生活没有完全解决，也占这次合作

的相当成分。”〔引自《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家书》〕。

1925年9月7日，周素园回到了故乡毕节，脱离了贵州军政界，闭门读书。但他不是做隐士，不是在家享清福，他的思想在积极索求。他在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教训，他在探索解救中国、改造社会的真理，他在寻找指导人生的正确思想。从回毕节至1936年2月的十来年间，他不仅读了许多中外历史书籍，不仅读了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名著，他还认真研究了許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。现在知道书名的有：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通俗资本论》、《共产主义ABC》、《新政治经济学》等十几种。

通过学习和思索，周素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，找到了正确的世界观，并用之对自己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理。使自己思想上有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和飞跃。他自己说：“余近年常阅新书，加以冥思旁证，颇能日趋解放。”〔引自《1935年9月5日家书》〕。后来，他又说：“五十以后自己有了一个转变”。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些家书和著作中，可以看出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或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。

他认识到：“军事常为政治的工具”，必须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。必须“使武力与人民结合”，“使武力化为人民之武力”。“军队无意志，以民众之意志为意志；军队无利益，以民众之利益为利益。”〔引自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官训练团同学录序》，见《素园文存》〕。

他认识了：“宗教基础，完全是建立在迷信上面（不迷信，不成为宗教）。”“而统治阶级因为尊重彼教，于他们有莫大利益，也就随时随地加以维护。”〔引自1932年4月30日家书〕。

他认为：妇女只有在学习、工作和经济

上同男子平等了，才能真正解放〔见《1932年5月12日家书》〕。

他认为：旧中国的社会制度已使读书求学变为“资产阶级的特权”，必须改变这种“恶制度”。“使一般劳苦大众的子弟，都能享求高等教育的机会。”〔引自《1935年9月5日家书》。〕

他还批判了那种把子女的人格抹煞了的封建伦理的家庭关系，他把家庭关系视为“不过是一种社会关系罢了。”〔引自《1935年10月23日家书》。〕

在这时期，他于1927年至1928年收集资料，写成《贵州国民党痛史》一书。这是研究贵州辛亥革命史的一篇重要资料。他还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，处处流露了他赤诚的爱国之心。1926年当他知道贵州省政府准备以兴修铁路为名举借外债，他写信给友人反对这样做。他说：“弟敢断言，该款必流用于军费，必且因该款而扩充无数之队伍，必且因该款而酝酿无数之战争。而铁路亦终于不就，而吾民之负担则已无法解除矣！”〔引自《致李小谷》，见蓝格本《素园书牍》卷十〕。1935年，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，又步步紧逼，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。祖国危亡迫在目前，民族生存危若垒卵，内心焦急，但豺狼当道，他报国无门。

正因为周素园已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初步掌握了无产阶级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又加上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，救民之志，当1936年2月9日红军到毕节后，他便非常容易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主张。他不顾自己高龄，不顾身体病弱，不顾妻室儿女，在那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革命低潮时期，挺身而出，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行列。

红军到毕节后不久，周素园被任命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。消息传开，好多人都说：“周素园都投靠共产党了！”在社会上

震动很大。在短时间里，贵州抗日救国军就发展到三个支队，1,000人枪。扩充红军的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，部队吸收了5,000名新兵。这些成就，除了党的正确领导，群众的觉悟之外，也有周素园个人的积极工作和影响。

根据红二、六军团领导同志的指示，周素园给滇军的上层人士龙云、孙渡、鲁道元写了信。在给龙云的信中，他告诉龙云“红军是不好打的”。中央军进入云南、贵州，怀有一箭双雕的目的，“假道灭虢，史有明鉴。”在给孙渡的信中，他说，中国共产党的“策略非常进步，路线非常正确。鉴于目前形势，最近决议扩大民族革命战线，联合一切反日反蒋的力量，来组织抗日救国的政府和抗日救国军。我相信不久的将来，必要新局面的大开展。”他希望孙渡“积极则回戈杀贼，消极则保存实力。”〔转引自顾隆刚：《周素园参加红军长征前后思想的演变》，载《贵州史学》1986年第1期〕。肖克同志后来说，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，周素园的信“打中了他的要害。所以孙渡就在威宁、昭通，按兵不动。国民党追击军主力从东面向我进攻，但孙渡纵队在西面按兵不动的态势，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”〔引自肖克：《红二、六军团会师前后——献给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同志》，载《近代史研究》1980年第1期〕。孙渡在红二、六军团进入云南境内后，多次采取了“消极以保存实力”的态度，为红军二、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，渡过金沙江天险，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1936年2月27日，周素园同红军离开了毕节，随六军团政治部行动。部队进入乌蒙山区与敌人回旋，这一带山高林密，气候恶劣，人烟稀少，给养困难。部队经常在雨雪交加，缺粮断水的情况下行军作战。任弼时、贺龙等同志担心他的身体经受不住长途跋涉的劳苦，派邓止戈劝说周素园离队去香

港。他非常激动地说：我“六十岁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。今天参加了红军，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，死也要死在红军里。”离毕节时他是坐滑竿，从云南平彝（今名富源）境内起骑马。4月27日，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巨甸。那天是农历润三月初七，是他度过的最有意义的生日。渡过金沙江，爬过一座又一座的雪山，穿过一片又一片的原始森林，6月3日随军在甲洼与红九军团会师。7月下旬到了甘孜。在甘孜，周素园写了一篇文章，“由电台广播，揭发蒋介石降日卖国，呼吁各省起义抗日。”〔引自《周素园自传》〕。

8月1日，周素园奉命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，离甘孜，经阿坝，过草地，越岷山，翻腊子口，入甘肃境，9月到达岷州。在岷州成立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，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。10月9日，随部队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。12月7日，到达陕北保安。

历时9月，行程万里，经历千辛万苦，渡过万水千山，周素园作为一个爱国民主人士，参加红军长征，胜利到达陕北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象他这样高龄参加过长征的民主人士，大概是唯一的一位。

到保安后，周素园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多次亲切接见，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，鼓励他继续学习和工作。不久，西安事变发生。他在“西安事变过程中，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写信给何应钦、王伯群、吴忠信、张学良、朱绍良等。”〔引自《周素园自传》〕，以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。

1936年12月底，周素园到了肤施〔即延安〕。在肤施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及政治经济学等等。

1937年3月5日，他在家信中寄回七言诗二首。原文如下：

“春日小极（注）书怀

〔注：小极，作疲乏之极解。〕

艰难尝尽好归田，  
退老闲居十二年，  
漫信山中能避地，  
翻从井底得观天。  
强权胜后人无类，  
学道成时犬亦仙。  
为导迷盲遵觉路，  
敢辞残废作先鞭。

※ ※ ※

“慈悲只是口头禅，”  
遗臭流芳两漠然。  
祖国山河甘断送，  
吾曹兄弟苦颠连。  
前途展拓凭金革，  
大任担当要铁肩。  
可有还童真妙术？  
让余腾步学高骞（注）。”

〔注：骞作振翼而飞解，高骞即振翼高飞。〕

这是他自己参加红军长征前后思想的概括和总结。

1937年春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停顿时，周素园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，写信给张道藩、张继、吴忠信、冯玉祥等人，以推动国共合作早日实现。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。

在延安时期，党对周素园生活上给予很高的优待和照顾。但由于年事已高，体质很弱，从1937年8月中旬起，他两脚红肿，流水流血，不能着地，久治不愈，生活不能自理。他觉得自己不能工作，反而成了党和八路军的“坐享优待”的累赘，于是动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。他将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同志。1937年10月6日，毛泽东同志给他写信说：“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，并不觉得你是‘坐享优待’。先生的行止与工作，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、兴趣来决定，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，不比年轻人。”“先生所提

回黔并工作的计划，我是全部同意的。”

〔引自《致周素园》，载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第108—109页〕。

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、两党关系比较和缓的政治形势下，1937年10月23日，周素园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，带着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，离开延安，访问国民党政府西南各省当局，要求释放政治犯，并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，扩大政治影响。

10月8日，他到了重庆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行营主任“贺国光拒绝晤见，只用信函作不着边际的答复。”〔引自《周素园自传》〕。

11月底，他离开重庆到了成都。12月，受四川省政府聘为顾问。“到成都，接洽颇为圆满，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允汇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。四川动员委员会的张澜、胡景翼乐意把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，送给群众阅读。”〔引自《周素园自传》。〕这时，龙云两次来电邀他去昆明。

1938年1月12日，周素园抵达昆明。起初，龙云和其他一些上层人士对他优礼有加。2月，被委任云南省政府谘谋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那时昆明人一般称我为共产党代表，他们对于新事物非常爱好，经常请我吃饭，约我谈话。我也借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，表扬八路军作战的英勇成绩，并针对国民党的诽谤，给予了无情的驳斥”。

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十八，1956年1月10日〕。“每日来寓访问的，不分性别，不论老幼，不计职业，平均总在二十人以上。”

“介绍了朱家璧等一些青年去延安学习。又把西安寄来的理论书籍留给郑一斋、徐嘉瑞、刘惠之等，鼓励他们举办座谈会，作初步研究。”〔引自《周素园自传》〕。郑一斋慷慨捐助了巨款，购买创伤特效药“白仙丹”（今名云南白药）20,000盒，由航空邮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，转运前方应急。他的

活动使龙云很恼怒，派了警探跟踪追逐。最后由云南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胡蕴山当面提出警告，再不识相，他们就不客气了。他于是离开了昆明。

1938年4月13日，周素园回到贵阳。贵州反动统治当局对他布置了周密的防范和监视。并由中统特务头子陈惕庐以党务负责人的身份，对他当面警告，不许他在贵阳久留，让他回原籍“养病”。

同年5月14日，周素园回到毕节，立即受到了严密的监视达十二年之久。在白色恐怖下，他没有被反动派的威逼而放弃自己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没有做一件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事，没有说一句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话。仍然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。先后精读了《资本论》、《反杜林论》、《法兰西内战》、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、《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、《列宁文选》、《列宁主义问题》、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等。他的心是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，他1945年到重庆，曾想和周恩来、董必武同志取得联系，未能如愿。

党和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忘记周素园。重庆《新华日报》长期给他免费订阅的优待。毛泽东同志在四十年代初，请黄齐生先生从延安带一条陕甘宁边区生产的毛毯送他。中央青委通过贵州地下党组织请他写过有关贵州青年运动史的文章。

在此期间，他写作了一些重要史料，重新整理了自己毕生文稿。先后写成《贵州护国、护法两役战史》、《贵州陆军史述要》、及《西行追忆录》等。整理了《素园文存》五卷，和蓝格本《素园书牋》十四卷。

在此期间，反动政权为了对周素园进行羁绊，1938年10月任命他为贵州省政府参议，1940年为省参议员，1941年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采访，1945年为国民参政会参

政员。这些都是闲职，用不着上班，任职的时间都不长。1947年6月，他写信要求辞去参政员之职，邵力子复信不准许。是年秋，邵力子来信动员他参加伪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竞选，让他自择一种，他们好作安排。他复信拒绝之。信中还反动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抨击。他说：“民穷财尽，农村破产”。此八字者，自少年握管学文，引用过若干次。乃昔之视为危言者，今一一见诸事实矣。”“老百姓饥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劳力所入，公家十取其七八。中产完全没落，失业已成普遍现象。”“今则以有利为专家，以聚敛为能事，而民力既竭，从无一人肯言及之。”〔引自《致邵力子》，见蓝格本《素园书牋》卷十四〕。

在那国民党统治地区经济逐渐崩溃，百物日日昂贵，货币天天贬值的岁月里，周素园贫病交困。他“经济状况万窘，每天都在煎熬(熬)中过日子”。〔引自《1942年11月26日家书》〕。有时他没钱买邮票寄信，甚至买小菜和包烟丝的钱都没有。他说：“近日之窘，真已到山穷水尽处矣！”〔引自《待尽日记》第九卷，1949年6月3日〕。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缺医少药，他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。

反动派对周素园的政治压迫丝毫没有放松。他们长期对他进行监视。1949年夏，他们在贵阳逮捕、屠杀大批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同时，制造种种谣言对周素园进行公开的中伤和威胁，派遣以各种身份出现的特务分子对他更严密的监视。临近解放前夕，他们甚至妄图将周素园劫持而逃。

周素园“期待着光明，等候着光明，望见了光明，光明来到了！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一〕。1949年11月27日，毕节解放了！

周素园不顾自己年迈虚弱之身，积极投入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，协助恢复社会秩序，建立政权，发动群众，扩大统一战线等

一系列繁重的工作。他被推选为毕节县和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，为大军入川作战准备了粮秣。他给企图顽抗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写信，劝他们放下武器起义或投降，收到明显效果。他给当地领导同志介绍情况，反映社会各方面上层人士的思想动态。他给全省的“老朋友们”写了公开信，希望他们丢掉幻想，拥护党的政策，靠拢政府的周围，响应政府的号召。

1950年2月，周素园应邀到贵阳。省委领导同志接见了。他广泛的接触了社会各方面人士，听取了他们的反映，并转达省委领导同志，起到桥梁作用。

同年6月28日，周素园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。7月下旬，到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。7月31日，邓小平、刘伯承、贺龙等同志接见了，请他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。他以老疾残废相辞。经劝说，才接受了。

在减租退押、土地改革等等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中，他准备将存放多年的棺木出卖，作为偿还剥削债之需。土地改革中，他写信给留在毕节的亲属，把所有的土地契约和管业证呈交农民协会听候处理。他写了《为实施土地改革警告地主阶级》一文公开发表。他说，写这篇文章，“固然没人催促我，但我想在贵州这篇文章是没有第二个人比我合式的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四，1951年2月27日〕。

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，他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得的惩办而高兴。他写了《镇压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》一文公开发表。

在抗美援朝斗争中，他写了《谴责美帝暴行》、《为什么帝国主义要自掘坟墓》、《保证抗美援朝斗争胜利的客观条件》、《怎样制止美国野兽的细菌战》、《朝鲜战争两周年》、《追悼刘兴文》等等文章，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，号召全省人民坚



持抗美援朝斗争，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。当将要举行日内瓦会议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消息公布后，他写道：“这一重大事件〔指抗美援朝〕，三年多来每日都悬系在我心里。今天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。我们破天荒第一次赢得的国际胜利，光荣地写上了史册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十四，1954年2月21日〕。

在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中，他写了《警告违法资产阶级》一文公开发表。当有的亲友由于贪污问题受到审查来找他帮忙时，他都一律拒绝。他说：“按我的职责，对这些分子只有主张依法处理。亲友还亲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八，1952年3月11日〕。

1951年10月，周素园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二次全体会议。在北京，他会见了周恩来、朱德、林伯渠、肖克、王震等同志。毛泽东主席单独接见了她。她向毛主席对发展贵州交通事业，开发矿产，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等提了建议，并被采纳。

由于各级领导对他的关怀和照顾，他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。1951年7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去年今日在重庆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报到，为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一日。当时还恐不到会期终了便归泉路，不料忽忽经年，人而健在，而且可说比去年还好了许多。由此年复一年，眼看着多年理想圆满实现，岂非人生一大快事！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五〕。

他关心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。他对斯大林十分崇敬。斯大林逝世后，组织上觉得他那几天身体欠佳，不必参加追悼大会。他说：“但我不去，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一样，将增加几倍的难过。还是决定去参加。后来，秘书、警卫来劝阻，最后医生也来劝阻，还是决定必去。”

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十一，1953年3月9日〕。

1954年，周素园积极投入制定宪法和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。7月，在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后来，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

1955年2月，周素园被任命为贵州省副省长。

眼见国家欣欣向荣，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，周素园在他的晚年仍然竭智尽力地工作着。他对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和建议。

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，情况比较复杂。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原因，黔西北、川南、滇东北土目之间仍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，他建议这些地方的民主改革，最好是统一筹划，统一实施。〔见《光明日记》卷一，1950年2月26日〕。贵州省文史馆成立时，他提出：“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，尤望对少数民族多多留意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二十，1956年10月19日〕。

为了改造人们好逸恶劳的旧思想，他用三年多的时间，参考了很多书籍，写成《劳动原是人类的本能》一文。他说：“我的文章概括来说，就是要改变人们对劳动的态度，最好先改变人们对劳动的观点。”“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，还可使它（劳动第一）变成遗传的东西，本能的东西。一切资产阶级的残余，私有财产的毒素，毫无疑义根本清除了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十九，1956年4月6日〕。

他建议对工资制度实行改革。划一工资待遇，“取消供给制、薪给制名目，不使有两种近似对立的制度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十一，1953年1月26日〕。

他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制止浪费的提案。他说：“我考虑到的是浪费是节约的敌人。要根除浪费，拟建议有关机关制定一个专律，象惩治贪污条例那样，使得负责人都兢兢业业，不敢疏忽大意。”〔引自《光

明日记》卷十七，1955年6月8日〕。

他建议增加省政协列席代表中的妇女代表特别是家属代表名额。他认为：“让一般妇女都活跃起来，要求参加时事学习，影响会很大的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二十，1956年7月20日〕。

他建议提高基层干部的政治、文化水平；轮训干部以加强法制观念。

他关心文化教育事业。把自己珍藏的近万册书籍捐赠毕节县文化馆。毕节县一中新修校舍，征用他的住宅，他大力支持。他希望学校“适应国家需要培养建设人材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十四，1954年7月11日〕。

他对青少年寄以无限的希望，并非常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。他给团省委的贺词中说：“对于广大群众，当他们迟疑畏缩的时候，青年就起示范作用；在他们“力所不及”的场合，青年就自动帮助。有好处则退居人后，遇困难或危险则争取前列。这是青年最宝贵的信条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二十二，1957年5月10日〕。他还建议取缔在社会上流行的荒诞武打小说。

他经过长期的考虑，起草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稿。信中大意说：建国以来，党和毛主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，土地改革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。农村粮食统购以后，出现了“轻微的抵触”。

“合作化运动，大体说是农民自愿的”，“可是一般说来，条件还不够成熟。”有的基层干部“为了避免右倾保守。他们一股劲地冒进，遇到障碍更加上强迫命令。”“我认为，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增加收入这一口号能否实现的问题。”他建议，秋收后将农业税的一部份，

“作为一次特别农贷，即一次无须偿还的农贷，使农民皆大欢喜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二十一，1956年11月16日〕。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，在论述上虽有不够完

备的地方，但正象他自己说的，“它是我的良心。”他还说：“自己看到快要死了，但怎样对得起人民，怎样对得起领导？自己想说的话，应该鼓起勇气说出来。才可以说的个“死而无憾”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二十，1956年10月30日〕。

周素园信奉马克思主义，他不断自觉地学习着。从贵州解放至他去世前的八年中，他认真学习了《资本论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哲学的贫困》、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》、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》、《列宁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》、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、《毛泽东选集》等等，共30来种。其中有的还反复读过两三遍。他还学习了大量关于社会发展史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、政治经济学、世界近代史、中国通史、生理学、心理学的教科书和专著。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大量的报纸杂志。他在1958年1月23日写了毕生最后一篇日记，所记载的全是当天的学习情况。

周素园在绝望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从此他坚信不渝。他在黑暗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，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独立自由，为祖国的兴旺发达，竭尽了自己的力量。他说：“我没有申请加入党，因为我的缺点很显著”，“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。”〔引自《干部登记表》〕。但他得知子女中有的被吸收入党了，有的正在积极争取入党，他说：“我正告他们，一个人快死的时候，总是留念于自己子女的前途，假使你们都奉共产党为依归，我死也瞑目了。”〔引自《光明日记》卷十六，1955年1月10日〕。

1958年2月1日，周素园病逝于贵阳，终年七十九岁。

周素园一生坚持在学习中思索，在思索中前进，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，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。他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挣脱出来，最初

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，又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变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，最后转变到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。他组织上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但他坚信马克思列

宁主义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早已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。

(执笔：王葆和)

来函照登

编辑同志：

这次《执着的追求》一文的审改，我很欣赏，可谓“小巧玲珑”。你们的斧正达到了我望而未及的目的。据悉，你们在编审过程中，曾征求蔡之诚同志的意见。这是完全应该的。只有反复核实，才能使本文更为准确。

现经与蔡之诚同志共同回忆核实，有两点属蔡之诚回忆有误，请更正。

1. 114页倒数第4行，“蔡之诚为总负责人”应为“蔡之诚为常务干事”。
2. 116页末行“湖南”应为“重庆”。117页“后来到了重庆”应删去。

此外，第114页第9行应为“反共高潮”，第116页第10行，应为“孟昭芳等”。

致

敬礼

车祖尧

1986.12.20.